

# 都市裏的圍村

西方有城堡，東方有圍屋，兩者功能都旨在對外防禦。走出粉嶺港鐵站，穿過繁忙的商業中心，幾分鐘來到蜿蜒寧靜的粉嶺圍村。高樓不見了，四周清一色的三層樓村屋，從都市到鄉村，概念陡然轉換。粉嶺圍，若非眼見為實，很難將它與大都市掛鉤。

這是一個大型民宅群，建於明朝萬曆年間，住着新界五大家族之一的彭氏家族。圍村包括粉嶺圍、圍屋、風水魚塘。宋朝末年，彭氏家族從潮州揭陽遷來香港，看中了粉嶺這個地區，便在此興建圍屋，繁衍後代，目前村裏的三千多戶人家，全部姓彭。

圍屋呈方形，外面的廣場頗大，風水魚塘頗闊。三棟帶槍眼的碉樓，上面各有三個成品字形的白色大圓點，有人說那是彭氏家族的徽號，有人說那是風水圖。碉樓以花崗石為牆基，覆以青磚牆為外圍。碉樓與碉樓之間的空隙已經被房屋填滿，圍牆也已消失，舊時的壕溝亦沒有蹤影。

圍屋外面矗立着一座炮台，炮台上面有三門土炮，旁邊豎着兩根旗杆，一面飄着五星紅旗，一面飄着紫荊花旗。炮台是當年用來抵禦山賊和海盜的，一九四一年當日軍侵佔香港時，村民將三台古炮藏於地下，直至一九八六年才挖出重新安置。

從中間那座碉樓走進圍屋，門



柳絮紛飛  
小冰

框上的對聯「前環鳳水後擁龍山」是對這裏地理位置恰到好處的寫照，前呼後擁，財豐勢大，規劃者頗費心思。大門上有粗壯的木柱，木柱可以伸縮，伸出來封門，縮進去供人通過，這是嶺南地區的建築特色。

進門後，窄窄的過道上方可見一線天，沿右邊的木梯而上可觀察敵情。圍屋儼然一個壓縮版的舊城市，門挨着門，窗連着窗，狹窄的人行道，細細的排水溝，房屋之間水洩不通。發現一個小天井，裏面有一口古井，還見一個浴室似的公共空間。大概是為了讓空氣流通，有的家庭把門敞開着。住在圍屋深處的人，我想，他們回家的路挺迂迴。

在新市鎮發展初期，粉嶺村村民與政府達成協定，將村前的土地交與政府發展成公園。在尊重地區文化的前提下，相關部門保留了圍村清幽古樸的特色，在外圍建成當下的中式園林公園，即「北區公園」，維持了這一帶相對低密度的格局，建立起居民休閒娛樂的舒適空間。

粉嶺圍的古建築還包括「思德書室」和「粉嶺圍鄉公所」。「鄉公所」是一個老詞彙，是我對內地上世紀鄉村僻壤的記憶。早已隨潮流而逝的事物，沒想到在這裏複習了一下。粉嶺圍是一個「鄉音兒」。



文化什錦  
陳德錦

三月天，興許也該談談春社這幾乎已被遺忘的古老節日。先談日期。漢代以後，民曆以立春和立秋後第五個戊日為社日，通常在春分和秋分前後。今年的春社是在陽曆三月廿一日。春秋兩社，相隔半年。春社為春耕風調雨順而祈福，秋社則為百穀豐稔而報功，祭酬的對象是土地之神，也就是「社」。

兩個社日，春社特別隆重，充滿歡樂氣氛。也許是乘了「鬧元宵」的餘興，老百姓在這天共聚於里巷，喝酒吃肉，花前樹下，笑語咿歌。南宋詩人陸遊在《春社》詩中說「太平處處是優場，社日兒童喜欲狂」。優場就是戲場，社日裏農村有草台戲上演，是娛神又娛人的節目。魯迅的《社戲》，敘述者回憶少年時與同伴坐小船到鄰村看戲，戲台傳來笛聲，婉轉悠揚，心思也「彌散在含着豆麥蘊藻之香的夜氣裏」。離開家園，到野外捉蝦摸魚、摘瓜採豆，人也變得活潑暢快。

陸放翁眼中的社日，與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武陵人所見「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情境十分相似。那是民眾不勞智巧、順從自然、安身立命的率真表現。農村社會仰賴社日促進交誼，待人要公平有禮。漢代做過高級官員的陳平，曾擔任社首之職，任務之一是分豬肉給民眾，而他因「分肉甚均」得村人稱頌。

千百年後，現代社會崇尚科學，將祭祀土地視為迷信，而與祭社相關連的娛樂活動，也隨之失落。像魯迅那麼有感性的手筆記錄了民國前社日的情况，畢竟很少，興許也勾起了現代人的一絲鄉愁吧。社日的酬祀對象是土地。幾百年前，新界村民以石塊建造社壇，以供祈福，遺蹟至今仍可見。土地有神，在民眾的觀念中還依託為大地上的樹木。歷代不同地區的社樹有松、柏、梓、槐、桑等，南方甚

至以茶、榕為社樹。高聳入雲的大樹有如天梯可上通神界，木材和果實又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寶貴資源，崇敬大自然演變成保育大自然，也是理所當然。三月廿一日恰巧也是「世界森林日」，倡立者聯合國大會藉此向世界呼籲保護林木，減少碳排放，讓地球資源和多元生態能持續發展。

春天畢竟是萬物孕育的季節。時屆晝夜均分的仲春節氣，耕種步伐加快。伊朗、阿塞拜疆等東亞國家也以三月廿一日為「諾魯孜日」，男女老少在此日共聚歡度，頌讚春來大地，期待豐收。由此可見，慶祝春至、感謝大地恩賜的嘉年華感情，古今中外都有共通之處。

昔日民眾在春社裏敬土酬神，守望相助，也是經歷無數災難之後的生活歷程。年來社交活動因疫情而消滅，至今仍未全面恢復。但不久之將來，我們終必會走出疫症的陰霾，在還未能除去口罩、歡欣無間交談吃喝之前，回顧社日的意義，肯定能感受到多一分希望和溫暖。

# 香港之治——誰來治？為誰治？



君子玉言  
小香

進入三月，農事忙耕作，國事繪藍圖。中國又進入兩會季，「十四五」規劃即將出台。三月五日人大開幕式上，除了政府工作報告，還就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作說明，為「愛國者治港」提供制度保障。「愛國者治港」成為兩地、兩會熱議的話題。

香港街面貌似平靜，實則依然紛雜：忙着抗疫防疫，自二月下旬疫苗抵港網上預約，至今已九萬多人接種，但每天仍有一二十病例；忙着「打小人」——這可能是港味文化遺產了。驚蟄萬物萌發日，「小人」蠢蠢欲動時，借驚蟄驅毒除魅。鵝頸橋下求「打小人」的市民排成了長龍，男女老少皆有。今年「打小人」以「疫情」為最多，去年不少人專打特朗普。「神婆」用鞋子捶打紙符的聲音劈哩啪啦，和着香火的味道，飄盪在銅鑼灣的霓虹高樓間。還有人忙着打官司，四十七人因參與去年所謂「立法會初選」觸犯香港國安法被訴，法庭上這批政客突然變成「實力派」演員：痛哭流涕的、暈倒送醫院的……還有約二百名公務員，在年初港府要求四周內所有現職公務員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限期於二月底結束後，拒絕簽署，面臨被辭退。

香港怪事多多。愛國，本是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核心價值，是發於心聽於言見於行再自然不過的，就像愛父母一樣天經地義堂堂正正——在香港卻成了磨心，多年來羞於啟齒或屢遭無聊置喙。公務人員要為民服務、為民擔當——但在疫情艱難、經濟低迷、失業人口高達二十六萬創十七年最多的情況下，還有兩個香港公務員工會致信財政司長要求寬免公務員薪俸稅，稱公務員「消費意欲理論上比任何人高，減免稅項能刺激經濟」。此前，十餘萬公務員已因疫情「居家辦公」四五個月了。有新到港朋友因入境處關門，來港三個



維港一景。  
香港中通社

月遲遲不能辦身份證成了「黑戶」（香港法例規定「任何人如未能按規定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查閱，即屬違法」），每天只敢在公司和住處半徑五百米範圍內步行。面對疫情，自己做好防護也要保護他人——但香港坊間說最多一個詞是「誘因」，叫他做檢測打疫苗，還要有利誘驅使。奇怪！疫情面前，生命健康不是最大的誘因嗎？為什麼要與金錢利益聯繫起來呢？凡此種種，究竟是怎樣的腦回路？

香港年輕朋友告訴我，港人思考問題絕大多數是港本位而不是國本位。最近看到兆佳所著《香港人的政治心態》，老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指：「一般而言，港人對政治的態度是務實及功利的，如何衡量政治及政治參與的價值，主要取決於能夠為自己帶來多少實際利益。」以我觀察，不僅對政治，部分港人對任何事物都是這般心態，考慮問題基本兩個出發點「與我有什麼關係」「對我有什麼好處」。這種心態成了尋求香港問題答案一個很重要的密鑰。

中央要求特區負重要管治責任人士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原則、敢於擔當；胸懷「國之大者」；精誠團結。有人叫好，說中央點到了管治團隊癥結；有人反思：「從政者應為「服務者」，服務一方百姓。然而，這樣的信念在香港已十分罕見，我

們見到的，是懶散打工的公務員，為選票而鬥爭的政黨，「不食人間煙火」的官員……若掌握香港發展和市民福祉的官員、議員們，都只為了錢、為了權、為了贏，香港還能有明天嗎？」「都說香港缺乏政治人才，然而，體制內外對香港的方向、決策有推動作用的一眾政治精英，無論學識還是經驗，都足以稱得上「政治人才」。可惜，他們的「才能」逐漸被政治技巧埋沒，為人民服務的使命感也被遺忘。」

施政，從來不是技術手藝，而是政治智慧，是需要大局觀，需要具有忘我乃至無我境界的。胸懷「國之大者」，就是要以國之大要、國之大局、國之大事、國之大計為出發點，審時度勢、由大觀己、由己思大。香港之事，不僅是一地之事，也是一國之事。香港施政之舉，看起來是一樁修法改例「技術活兒」，卻可能成為多米諾骨牌中之一隻，對國家也對香港局面帶來深刻影響。香港之治，應該為國家而治、為人民而治；治理者既要對國家對中央負責，亦要對市民負責。奉國為大，奉民為尊。只有心存「國之大者」「民之尊者」情懷，才能具備「國之大者」的敬畏心、「民之尊者」的謙卑心。

香港正在經歷正骨矯形的陣痛。要將扭曲的骨型扳正過來，過程可能會很艱難，但卻是必須的。經歷過陣痛，才能迎來健康成長行穩致遠。

# 聚道傳承

香港藝術館現正舉行「聚道傳承——敏求精舍六十周年」展覽，展出收藏家組織「敏求精舍」四十多位成員的三百多項中國藝術品，涵蓋明清時期的沈周、文徵明、王時敏和董其昌的書畫，宋元青瓷和白瓷、明清的青花瓷器及多彩瓷器，以至剔雕漆器、玉器、竹雕、明式傢具和鼻煙壺，以及反映近代外貿歷史變遷的外銷藝術。展期至六月十六日。

圖為展出的清代乾隆時期的醬色綢繡五彩雲蝠金龍十二章紋吉服袍料。

政府新聞處



市井萬象



# 金庸與「福威鏢局」

不覺之間，金庸已離開我們兩年多了。從張無忌到韋小寶、從明教到天地會、從跌宕起伏到快意恩仇，金庸用筆為無數讀者構建了一個風生水起的江湖，也陪伴着我們度過了青春年少。回望金庸先生作品，發現他與福建的緣分匪淺。在他筆下，有八位大俠與福建結下不解之緣，福建的不少著名景點，故事就是從福州開始的。在「福威鏢局」，各路英雄好漢雲集福州，搶奪《辟邪劍譜》，以這件事來展開小說的脈絡。

記得在十多年前的八月，我因為經商順道遊玩了武夷山。那天下午，時任南平市委書記雷春美打電話給我，說晚上她設宴款待來武夷山遊玩的金庸夫婦，請我出席作陪。晚上飯局，因為同是港人，共同話題就多了些。香港時事趣聞、武夷茶道、武俠小說，金庸談興很濃。在酒酣飯飽之際，我問金庸，你寫了「福威鏢局」，之前是否常來福州。他說，在寫這些小說時，從沒來過福建。出現在書裏的名山大川他也大多沒有去

過，但他有收藏一整套福州的風俗書籍和祖國各地山川民俗的書籍，從中領略了祖國的美麗與奇特。

金庸充滿意境的武俠世界的構建，除了出色的想像力，更離不開他淵博的學識。這一點從金庸私人書齋裏就可見一斑。聽金夫人在飯桌上說，金老在香港那個兩百多平米的書齋裏堆滿了書。平時他一有空，就是泡一壺茶，坐在書齋裏靜靜地讀書。當年金老已逾八旬高齡，仍堅持每天讀書四、五個小時。金庸的作品好讀、好玩，雖然多是通俗小說類型，但他的武俠小說富含江湖俠義、文化底蘊和人生哲理。這也是大家對金庸武俠小說評價甚高的原因之一。

《笑傲江湖》應該是金庸先生正面敘述福建篇幅最多的一部小說。從山川、人物到語言、風俗均有所涉及。現在很多金庸迷一說到福州，就會聯想到《笑傲江湖》裏的「福威鏢局」，聯想到林遠圖臨死前，曾請求令狐沖代為向兒子林平之轉達祖傳遺言：「向陽巷老宅中的祖先遺物不可妄自翻

看。」福州的林家老宅即為《辟邪劍譜》的藏寶之地，滿是神秘色彩。

林家老宅在向陽巷，位於福州的三坊七巷內。因為年代久遠，很多老宅都拆了蓋新房。幸好，三坊七巷作為歷史文化古蹟被保留下來和重新規劃，許多古舊危房也得修繕、復原，並堅持「修舊如舊」。如今的三坊七巷時常遊人如織，成為全國著名的旅遊景點。人們徜徉在幽深優雅的坊間巷裏，沉醉於「福威鏢局」等古民居雕樑畫棟的精美絕倫，流連於劉家大院、郭柏蔭故居、林聰彝故居以及小黃樓之匠心獨具的古建築之中。

「福威鏢局」源自明代的福州。書中描寫：「福威鏢局」門口的青石板路直通西門。按此描述，鏢局就在西門與鼓樓之間。我按圖索驥，果然在三坊七巷內找到了「福威鏢局」。那是一幢建築宏偉的宅，鏢局門口的兩邊房檐高聳，像兩杆大旗。右邊的房檐上畫着一隻雄獅，張牙舞爪。左邊的房檐上畫着一對蝙蝠。蝙蝠寓意着福氣，獅子

寓意着威風，整體連起來，這就是「福威鏢局」名字的來源。左邊房檐上就寫着「福威鏢局」四個字。再看它的大門，朱漆大門上打着一排排茶杯大的銅釘，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一進大門，兩邊各有一排長櫈，各坐着四個泥塑的膀闊腰圓的彪形大漢，以還原當年的威風場面。

當然，現實中就量掘地三尺也不可能再找到《辟邪劍譜》。我覺得金庸所謂的《辟邪劍譜》實際是泛指「俠義精神」。金庸是寫「俠」寫「義」的高手，他筆下的義，既有民族大義、國家正義，也有江湖道義，還有父子、師徒的倫常綱義。在他的武俠世界裏，無論是《書劍恩仇錄》中的紅花會、《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這些江湖團體，還是蕭峰、令狐沖這些英雄豪俠，乃至書中的普通人身上，都深深烙下一個「義」字。金庸在作品中對於「俠義」的認識及其藝術塑造，特別是他在借大俠郭靖之口，說出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讓俠義精神得到了真正昇華。



繽紛華夏  
魯力